

復活節華東之旅——

*高佑恩中國學習旅行第三團

溫順天著
游麗清譯*

我的好友高佑恩牧師 (REV. EWING “BUD” CARROLL)，是美國聯合衛理公會中國聯絡辦公處負責人，及中國近況 (CHINA TALK) 編輯。今年四月四日，復活節週一，他與我一起由香港啓德機場出發，展開我們所謂「高佑恩中國學習旅行第三團」之行程。(註)

老高和我只準備參觀華東內三個至四個城市，我們選擇了南京、上海、和福州作為目標，可能的話，再去參觀其他城市。

在南京，我們遇到很多新舊朋友，包括：丁光訓主教、韓文藻先生、以及金陵協和神學院教授陳澤民、林依萱和趙志恩，最後還有我們的同胞魏克利先生及其家人 (THE WICKERIS)，他們夫婦都是南京大學的英文教師，為期兩年，將於本年七月屆滿。

我倆在南京參觀了若干處有歷史價值的地方，清明節那天 (四月五日)，我們踏單車前往孫逸仙先生的陵墓——中山陵。我很多年沒有踏過單車了，因此，這次對我來說，實在是一份經驗，而單車是中國人民普遍的代步工具，我呢，最不費力就是從陵墓踏回來的時候，無他，全是下斜坡是也！

我們也來到了江蘇省的政府合署，區內有三處近代中國歷史上的重要地方，就是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的宮殿，一九一二年孫中

山先生臨時政府辦事處，以及一九二八至一九四九年間，中國國民政府的所在。在洪秀全的宮殿裏，我們看見一艘為他而造的石船停於塘中；我們也參觀了孫政府的辦公處和孫總統的寢室，這使我想起了早些時我到過的孫先生誕生的地方——廣東中山縣。

我們還參觀了南京幾處宗教地方，如：金陵協和神學院，天主教聖堂，栖霞山和尚寺，以及編印佛經的金陵刻經處。

金陵刻經處內，一切編印皆經人手。首先，在一房間內，工人將一頁書的文字雕刻在木版上，雕好後，交給鄰室的工人在字模版上塗上墨水，並放上一張薄紙，再利用滾軸把字模壓印在紙上，如此，一頁便告完成，最後，另一室的工人將各活頁釘裝成書。



該刻經處由一名佛教居士（已婚佛教徒，終生事奉佛祖，帶髮修行）楊仁山（一八三七至一九一一）所創，已有近百年的歷史。現時的李安先生，是第四任的負責人。李先生告訴我們，該處原有成千部佛經的木刻字版，可是有些在文革期間給紅衛兵毀壞了，有些則散落周圍，零亂顛倒。現在，他們一方面要把毀壞了的樣版修補好，另一方面又要將倒亂的次序重新排列；雖然如此，在這幾年間，他們仍能將其中八十部佛典重印。

栖霞山和尚寺，距南京二十五公里，那裏有近二百名初學和尚，當地人稱之為「小和尚」，他們來自中國各地，在這裏接受一年的訓練，然後再到其他寺院工作。我們抵步時，這班小和尚剛好外出，結果緣慳一面；在寺院周圍的巖穴內，我們看到很多佛像都沒有頭，文革造成的破壞，於此又可見一斑。

一天，我們來到南京石鼓路聖母無染原罪堂。雖然在文革期間，聖堂被佔據作工廠的痕跡猶存於正門大閘上，但整座聖堂經已全部修葺過，並且歸還教會管理。當我們被帶引至聖堂旁邊的大廳時，看到牆上掛着一幅達文西「最後晚餐」的絨畫；我們在那裏與錢惠民主教、徐先生和劉先生愉快地暢談了一小時，當答覆堂區牧民活動的詢問時，錢主教表示，聖堂開放已一年多，他們都一而再的努力去團結堂區教友，例如，去年復活節彌撒只有七、八十人參加，而今年復活節却有五百人參加。至於堂區活動，他們想組織一隊聖詠團，而目前的彌撒音樂，是由錄音機播放出來的。

徐先生在基督教金陵協和神學院教授中國古典文學，他本身是一名天主教徒，他告

訴我們，錢主教正盡力將教會一切財物取回；劉先生拿來了四本大相簿，從相片中，我們看到一些南京訪客，著名的外國天主教朋友，如：奧地利維也納柯尼希樞機（CARDINAL KOENIG），法國的衛青心神父及加拿大的朱梅芬修女。此外，還有錢主教於一九八一年七月與其他四名主教一起被祝聖為主教的照片，以及他就任南京主教，和一九八〇年五、六月間在北京與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教務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時的照片，該次會議約有二百名代表出席。

臨行前，劉先生送了八張有關南京天主教會情況的明信片給我們。事實上，這些明信片，我們都已經看過，因為那是在我們酒店的商店內可以買到唯一有關南京事物的明信片。此外，他又贈給我們一張拜苦路的大海報，中央有基督升天的圖像。

四月八日星期五，老高和我乘午間十二時三十分火車由南京往上海，下午四時三十分抵達。在上海，酒店經常客滿，經過一番努力和堅持，我們方能在和平飯店訂得一個房間。

這裏，我們同樣遇到新相識和舊知己，他們是：基督教青年會總秘書李守寶，助理總秘書黃先生，他最近曾隨代表團到華盛頓訪問，基督教三自運動總秘書沈德溶，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江文漢，及上海國際禮拜堂牧師沈以藩。

四月九日星期六下午，我們與李先生及黃先生在西藏路青年會相聚，李先生告訴我們，整座建築物，現已歸還青年會，他們正計劃把房間修葺以接待訪客，希望藉此減輕酒店房間之不足，對上海旅遊業有點幫助。我們也曾嘗過找房間之苦，因此，我們鼓勵李先生和黃先生此舉。

基督教青年會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夠收回它在北京和天津的物業；但即使收回了，若沒有足夠人手管理的話，也是相當頭痛的。不過，在一些年青大學生的領導下武漢青年會發展得很迅速。李先生說，他們要將“C”放回Y M C A去，意即將基督精神（CHRISTIAN）重注入青年會內，因此，他們非常注重此間的聖經研討。他又對我們說，青年會自一八八五年在中國開始以來，不覺將近一百週年了！

四月十日的晚上，我和老高都有特別神聖的感覺，原因是：當天主日，我們參加了三間聖堂的禮儀，使我們有深深的感受。是日清早，我們先來到徐家匯天主堂參與彌撒，聖體降福時，詩班以拉丁文多聲部合唱「天皇后喜樂」，這使我憶起二十年前，我們在修院唱着這首聖詩的情景，禁不住也加入一起頌唱：「天皇后喜樂，天皇后喜樂，亞肋路亞！」

彌撒完畢，我們到聖堂後面與沈保智神父會面，由於我們約了沈德溶秘書到聖堂門口接我們到上海邊緣的一間鄉村教堂去參觀，因此，時間所限，只能跟他稍作寒暄，當我們看到聖堂上重新出現鐘樓時，沈神父告知我們，安放鐘樓的那天，政府和附近市民都非常合作，市政府將徐家匯區內的電力停了半天，並為方便大型起重機在聖堂附近操作起見，還將該處的電綫割斷，而鄰近工廠也得在早上停工半天。沈神父又告訴我們，現在上海教區有十三間天主堂開放着。

匆匆的到了早上八時半，沈秘書和他的司機經已驅車來到門口前，準備接我們到市郊，參觀一下前衛理公會之耶穌堂，它位於南海縣，距上海東南三十五公里。該堂於一九〇五年由衛理公會教士所創立，現由八十

四高齡的顧寶璋牧師主理，他在一九四八年到來主理時，早已有十名牧師在過那裏任職。顧牧師將有關該堂的歷史和現時情況告知我們。



顧寶璋牧師（左二）、與女兒和兒子、高牧師及作者（右一）合照。

文革期間，全國大部份教堂，包括耶穌堂在內，都被佔作工廠用途。顧牧師告訴我們，耶穌堂自一九八一年十一月重開以來，先後有兩批人接受了洗禮，第一批一百零七人，第二批一百二十一人，大多超過五十歲，女性較多。在顧牧師的團契裏，現有教友二千二百人，在主日，也最少有一千七百名教友到大教堂或聚會處參加崇拜。

為了方便農民早上到市場去購物，耶穌堂的主日崇拜於下午一時才開始。我們拜訪

的那個禮拜天，他們正為亡者舉行追思禮拜，我們都在其中，看見台前桌上，擺放着亡者的照片，並寫上亡者的姓名，字體秀美，清晰可見。雖然年事已高，但顧牧師在講道中，談及我們基督徒在基督內的新生命時，那份剛勁，使我們無視於死亡的恐懼。禮儀結束前，顧牧師邀請老高到台前作禮成之祝福；這使老高非常高興，也使他對這份兄弟般的情誼深深感動。

顧牧師並且告訴我們，南滙的天主堂經已於前復活主日重開，而他也參予了當時的慶典。我們雖沒有時間去參觀那聖堂，但顧牧師却一再向我表示，能得一位天主教神父來探訪他的教堂，他不知是如何的高興。

當日傍晚，我們返回上海，參加國際禮拜堂的崇拜。沈以藩牧師在講道中，引用路加福音裏門徒往厄瑪烏路上的情形，去解釋聖餐的意義。

四月十二日星期二，我們沒安排了甚麼活動，於是，老高和我便決定乘一小時火車，向南京方向北上，一訪風光如畫的蘇州。我們在蘇州的飯店吃過了一頓美味的海鮮中餐後，便去尋找基督教的使徒堂的所在，找到後，姚天惠牧師、包谷平牧師、黃伯楨同工和彭亦雲女同工都熱烈歡迎我們，他們愉快地回憶起一九八二年夏天，鄭生來神父和其他一些與驛有關的香港天主教教友到訪的情景，並對隨後驛（第廿一期）報導他們教會的消息，感到高興。

之後，我們依從姚牧師的指引去尋找天主教聖伯多祿聖堂，我們乘搭九號巴士直到終站，下車後向前直行約半小時入到鄉村內，抬頭一望，小村莊之田園房舍上，聖伯多祿堂隱約可見；沿路上，我們經過一些新建的、約四至五層高的單位建築物，路面也是

新鋪的，還有街燈設備，此等設施均屬於政府新近的屋宇發展計劃；由此可見，中國政府對解決國內多處地方的屋荒問題上，態度是認真的。聖伯多祿堂內，我們會晤了錢俊元神父，他於一九五五年晉鐸，現年五十九歲。該堂於文革時亦曾用作工廠，到一九八〇年交還給教會，但到一九八二年初，該堂方才修葺完峻重新開放。在主日，這裏有一台彌撒舉行，約四百名教友參加。

復活節彌撒有近六千人參加，這真使錢神父驚訝！他告訴我們，各鄉村都有人來參加彌撒，其中很多是漁民，有一位神父從上海來幫手，但單送聖體便花了一個小時有多，還有二千多名教友辦告解。錢神父說，由於給這麼多人赦罪和送聖體，以致完畢後他腰酸背痛。



钱惠民主教在送圣体

聖堂內有兩位屬於教區的修女，年齡分別是七十七和七十八歲。那時，較長的一位修女正在向一群青少年講授教理，他們都很留心的聽着，可是，一刻間拍照之聲，驚破了室中的靜默，年青的面孔上，一時間都綻放出有點驚訝的笑容。錢神父說，他們都是教友們的孩子，以前沒受過甚麼信仰訓練。

我們在聖堂前與錢神父及年輕的陳姓傳道員拍了些照片後，便匆匆告辭，因要趕及五時三十分的火車返回上海；況且，我們又先要步行一大段路回蘇州，再轉乘巴士才能到達火車站。

下一站是福州，從十四日至十六日，我們在這裏逗留了三天，探訪過天主教聖堂和鄰近東街口的福州花巷堂。我們在聖堂內會見了何神父和傳道員陳同志，在聖堂之上，有一個大房間，是準修生們住宿溫習的地方，一邊的窗簾，遮蔽着他們的睡處和讀書處。何神父告訴我們，他們正努力溫習，以應付佘山修院的入學考試。佘山修院在上海附近，他們都希望到那裏成爲第二批學生。

在福州花巷堂，我們愉快的跟薛平西主教及前聖公會秘書楊先生會面。薛主教說，很明顯，中國基督教會必定要走上三自的道路。現在，中國基督徒也是中國人民；但以前，中國基督徒往往不被視爲中國人的。薛主教又說，國外的基督徒必須瞭解中國教會的這種情況。

我們到福州的另一個特點就是想一睹福州的石碑。該碑於一九一〇年雕成，紀念第一批來福州的基督教傳教士，現存於福州于山福建省立藝術館內。他們都是衛理公會的傳教士，因此，對老高來說，特別有意義。我們購了五幅碑文的拓片，爲自己和送給朋友。

四月十六日星期六午後，我們由福州乘機抵達廣州白雲機場，由於交易會剛剛開始，難找酒店房間，因此立刻改變計劃，決定不在廣州逗留。

是日下午五時三十分，當我們所乘的飛機抵達啓德機場時，十二天的「高佑恩中國學習旅行第三團」遂匆匆結束。但老高和我都同意，此行除了與朋友叙舊之外，也學習了不少，同時，覺得在我們參觀過的區域內，天主教會和基督教會都比以前更爲活躍。



蘇州天主堂的要理班

註：該團本定於一九八二年十月起程，後因參加者太少而取銷。這個學習旅行的第一團和第二團我都有參加，而老高則希望，有一天只有我倆一起去，終於，願望實現了，就在復活節過後，我們再度出發。我們笑稱，一九八二年去不成，今次補數吧！老高現正計劃於一九八三年九月十月間組「第四團」，有關詳情及有意參加者，請致電其香港辦事處：3-7135271查詢。